

第一章 北京的茶馆

茶馆是服务性的商业企业，可是在商业范畴之外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茶客光顾茶馆的目的，在正常情况下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一种“追求”，所追求的是在其他场所饮茶所得不到的意境和心态。不同处境、不同文化档次的人，当然有不同的追求。所以，茶馆不但种类甚多，而且皆有文化气息。北京的茶馆文化十分丰富多采，可以说是北京茶文化的主流，亦是北京的茶馆不但享誉全国，而且闻名海外的主要原因。研究北京的茶馆，寻根溯源应从“茶源”始探，顺源逐流，自可了然。

一、北京茶文化溯源

(一)茶故乡是中国

植物学家、历史学家均认为茶的故乡是中国。茶的原产地在云贵高原，后传入蜀。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 59 年）时王褒的《僮约》，这个契约中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两项具体规定。由此可以推论，在西汉中叶以前成都一带已有饮茶之风。

生长在蜀中的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杨雄在其作品中也提到过茶。饮茶已成当时上层人士的时尚。茶顺长江东下，在三国时发展到了荆州、扬州地区。最早和茶结缘的是一些文人雅士。茶的这些“知音”为茶文化的形成打下始基。

两晋、南朝时期，清谈家、道家、释家……均有饮茶风尚。唐朝时期陆羽集“茶”之大成著《茶经》，茶文化开始形成。由于茶的产地在南方，所以茶文化首先在长江流域形成以后由南向北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讲，茶文化的中心区一直在南方，这不但是茶的产地在南方所决定的，也是唐以后我国经济、文化发达区由黄河流域南移到江淮流域所决定的。唐朝的茶文化是由文人、隐士、僧人阶层领导潮流。

在茶文化兴起于江淮地区的同时，幽州地区是唐王朝独挡两边（北边、东北边）的北方军事重镇，黄河以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沿边少数民族和内地交流的商贸中心，也是阿尔泰山丝绸之路上的四方交汇枢纽。其经济、文化呈现出熔南北、胡汉、中外为一炉的特征。

安史之乱以前，士大夫们好游幽燕，意在开阔眼界舒展胸臆。孟浩然、李白、陈子昂等人均有幽州之行。安史之乱以后，幽州成为卢龙军割据之地，一些失意的士大夫又到幽州来另谋发展，于是茶和茶文化也就开始传入幽州地区。由于幽州地区的经济、文化熔中外、南北、胡汉为一炉的特征，决定了茶文化在幽州地区也一定会形成强烈的地方特色。这种特色应该说是“胡化”。因为唐代幽州地区有大量侨置羁縻州，“胡人”的比例相当高，契丹人接触到茶和茶文化之后，为辽的茶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唐末五代时，幽州地区居民饮茶已经十分普遍。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时，禁南方茶商人幽州贩茶。令军士在大安山（今房山区大安山）采各种树叶制成“茶”，强行出售，获取暴

利。并改大安山为“大恩山”，以示“茶恩”。时至本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地区一直有制造假茶的行当，其始做俑者可溯源到刘仁恭父子。北京地区从唐末五代始就制做“假茶”，说明了北京地区历史上有很大的茶需求，需求量大是由于各阶层均有饮茶的风气。茶风一开，在普及的基础之上必然会产生提高。以文化而论，在普及基础之上的提高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有基之楼；在提高指导之下的普及，是遵循一定原则、方向的普及。唐末五代幽州地区茶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结合在一起，也就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幽州茶文化。幽州茶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南方的茶文化移植到幽州地区后，立刻披上了幽州地方色彩。能够制造出“假茶”，而且“假茶”还能代代相沿，说明了幽州地区对“茶”已有很深的了解，才能以假乱真，这种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给辽金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辽金元三朝茶文化概论

契丹人在唐末五代时已接触到茶和茶文化。公元 1005 年宋辽澶渊定盟之后，幽州地区成为宋辽交往的窗口。从经济上来讲，茶是双方大宗交易的物品，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需要以茶叶代替蔬菜来进行饮食上的调节。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对茶的需求更迫切。原产于农耕地区的茶进入游牧地区后，其文化基调当然也就发生了变化，和马背上的生活方式结合到了一起，呈现了粗犷、豪爽的草原情韵。

宋朝的茶文化是由宫廷和上层士大夫领导潮流，对茶的采集、加工精而又精。宫廷的贡茶称为龙团凤饼，每片可达数十万钱，其心理作用早已大大超出了实际使用价值。饮茶成为宫廷日常生活的内容，而且在国家礼仪中被纳入规范。宫廷茶文化虽然不能视为茶文化的主流，但上行下效，宫廷茶风自然而然地影响

到士大夫阶层。宋辽在澶渊之盟后，产生了百年和局，每年互遣使节行报聘之礼，宋的宫廷茶文化也影响到辽廷。辽廷的茶仪大多仿宋，宋辽互遣的使节均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而且双方均很重视科第名次。宋朝使辽的官员之中不乏茶人，原燕云十六州之中亦颇有茶文化的根基。上述诸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辽朝的茶文化结合自己的区域和民族特征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发展。

宋金对峙，但茶在军事对峙中还是得到了交流。由于金王朝各阶层对于茶的需求非常巨大，造成购茶岁费不下百万，白银大量流入南宋。金廷曾明令禁茶，规定七品以上官员方能饮茶，但是此令难于全面执行。从文字记载上来看，金辖区之内城镇茶肆仍到处可见。这和宋朝市民茶文化兴起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南宋都城临安及其属县人口已达一百一十万人之多，市民茶文化主要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进行社会交际的一种方式。泡茶法在南宋初年开始形成，也为饮茶的普及、简化开辟了道路，把茶文化从上层社会推向了民间。但纵观有金一代，北方虽有茶的需求，但茶文化却未能形成体系，这和国家分裂、文化的交流受到限制有直接的关系。

元统一了唐末以来分裂的政局，经济、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交流。宋朝的茶风崇尚奢华，形式也很繁琐，失去了晋唐以来茶人所努力发掘的茶文化的高洁本质以及传统的以茶雅志的精神，而是更多地在“茶”中找一些自我解脱。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均是物极必反，人为地造作太多了又促使质朴无华的茶文化重新振兴，在制茶、饮茶的方法上均出现了许多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散茶的流行，团茶已成宫廷贡品。饮茶的方式大体可归并为茗茶、末子茶、毛茶、腊茶四类，茗茶品饮方法已与泡茶相近；末子茶近于日本现代茶道用的末茶；毛茶是在茶中加入胡桃、芝麻、杏、松仁、枣……等，这种饮茶方法虽有失“正味”，但也别有韵味，时至今日不少地区饮茶仍有此遗风，但所加之物多有

增减；腊茶也就是团茶，但民间十分罕见。

有元一代不重视科举，儒生地位低下，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生地位低下是元王朝按民族把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进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一种具体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阶层需要以茶来浇开心中的郁结，用茗醇冲淡心中的惆怅。茶不同于酒，酒后酩酊，茶后更加清醒。在逆境中是需要清醒的，清醒是为了保持良好的情志，以求在逆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所以逸情雅志正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三）雅志与逸情——明清茶文化的特征

明王朝立国之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均很激烈，社会十分腐败。儒家思想发展成宋明理学之后，完全失去了积极用世的精神，“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天理），压制人民群众最低的合理要求（人欲）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们纵然心怀大志也无处施展，洁身自爱者又不愿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于是寄傲情于琴、棋、书、画，而茶与琴、棋、书、画又有不解之缘。明朝的士大夫最重名节、操守，视“不苟合于道、不苟立于朝”，“临难不苟免”为为人之本，以茶雅志、以茶砺节、以茶砥名成为茶文化的主流。故饮茶器具的命名均有深刻的含义，茶炉有“苦节君”之誉；盛茶具的都篮也就是“苦节君行省”了；培茶的笼子称为“连城”，贮水的坛子叫“云屯”，以茶雅志之用心可谓深远。

明末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惨遭屠杀，社会元气大伤。崇祯即位后，急于力挽危局，诸事操之过急，在位 17 年，易相 50 名，其政局可想而知。崇祯为人生性好疑，对臣下苛薄寡恩，朝臣为

了免祸，只有杜口不言。屈杀熊廷弼、袁崇焕之时竟无一人敢上疏进言，士风可谓江河日下。

爱新觉罗氏移鼎北京后，在实行民族压迫的同时又和汉族地主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合作。通过科举制度向士大夫阶层大开利禄之网，与此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实行思想禁锢。“开言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正是士大夫们的具体写照。“立于朝”不可能“谄于朝”，在这种情况下，茶文化也就由雅志、砥名、砺节的抒怀，发展成逸情、雅趣的风月之物了。寻觅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至多是“以茶养廉”的情趣。

（四）饮茶四要素——茶、水、器、境

名茶——灵气所钟

宋朝宫廷贡岁茶达 30 余万斤，凡 10 品。这 30 万斤茶均是明前（清明前）嫩叶所集。“茶纲”扰民，虽未有“花之纲”之烈，亦给民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明初，朱元璋废贡团茶，从此以后团茶退出了历史舞台。清代宫廷亦有贡茶，但所贡之茶在采集、加工方面并无异处，只求天下名茶，如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太湖洞庭山）、君山银针（湖南洞庭湖）等。宫廷聚天下名茶，上行下效，天下名茶也就聚于京城。

各地名茶聚于京城的渠道除宫廷贡茶之外，民间是由茶庄和会馆运送到北京的。茶庄由安徽商人所垄断，歙县商帮把安徽、浙江、福建、江苏四省名茶源源运入北京，茶庄的经营是纯商业性质的。出产名茶地区的会馆亦年年将家乡名茶运送到京，然后分送朝中权贵、京城名士和旅京同乡，其目的是“联谊”，不具有直接商业性质，但对茶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皇帝对朝臣赐茶，虽是一种“殊恩”但对茶文化亦有巨大影响。

福建武夷山、浙江天目山、江苏茅山以及杭州西湖、苏州太

湖出产的名茶均由京杭大运河水运进京。名茶进京的目的不论是“出售”还是“联谊”，都会和茶文化结缘。因为“名茶”出自“名山”、“名湖”，地灵物秀秉山川之真趣，也就披上了雋逸之气，形成了茶文化的初始内涵。名茶不论是用于出售还是联谊，其享受者大多是士大夫阶层的人士，这些人本来对茶就情有所钟，是千年的“知音”，以士大夫阶层为媒介，茶文化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诗文化、棋文化、书文化、琴文化……之中，并和儒、释、道二家均达到了“身”能“升堂入室”，“神”能“入境协韵”的微妙之中。

名水——天下几多第一泉

明许次纾《茶疏》云：“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茶圣陆羽认为宜茶之水山水为上，江水为中、井水为下。山水溯源也就是泉水；泉由井出，泉水也就成了井水；山水归江，山水也就成了江水；江中涌出涌泉，江水、泉水实难分取。唐人张又新著《煎茶水记》中，载陆羽口授天下二十名水次第：

- 江州庐山康王谷帘水第一；
- 常州无锡惠山石泉第二；
- 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
- 硤州扇子硖蛤蟆口水第四；
- 苏州虎丘寺石泉第五；
- 江州庐山招贤寺下石桥潭水第六；
- 扬州扬子江中冷水第七；
- 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
- 唐州桐柏山淮水泉第九；
- 江州庐山顶龙池水第十；

台州国清寺泉第十一；
 润州丹阳观音寺水第十二；
 汉江金州上流中冷水第十三；
 归州五虚洞春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关两谷水第十五；
 苏州吴淞江水第十六；
 召州天台西峰瀑布水第十七；
 彬州园泉第十八；
 严州桐庐江严陵滩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

这二十名水的排名榜，从其分布来说大多集中于江淮地区，远不能覆盖全国，其实北方决不乏名水。而且排名顺序又没有品评标准。故许多后世茶人认为是此榜决非陆羽所定，乃是张又新信口诌出来的杜撰之典。故自张又新后，茶人多好评水，号称天下第一泉者多达近 10 处，品评标准也开始逐渐形成，即源清、水甘、品活，质轻。

源清、水甘、品活在评比之中缺少客观标准，质轻是可借助于量器一较高低。最先进行这项实验的是乾隆，这位遍游南北名山大川的皇帝命内务府制银质小斗，严格称量天下名水的重量，得出如下结果：

京西玉泉斗水重一两；
 济南珍珠泉斗水重一两二厘；
 镇江金山寺泉斗水重一两三厘；
 苏州惠山虎跑泉斗水重一两四厘；
 平山泉斗水重一两六厘；
 清凉山、虎巨、京西碧云寺等地斗水重一两一分。
 于是京西玉泉山成为了钦定的天下第一泉。早在顺治年间，

摄政王多尔衮就认为“京师建都日久，地污水咸”。故宫廷之中一直饮用玉泉山的泉水。有经济条件的士大夫也都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取玉泉山的泉水供品茶之用。碧云寺等京西古刹均把寺中名泉当成“释家好施”之惠，供“施主”们取用，以佛门净水沏茶，茶水清明，饮之有脱凡人圣之逸情。因为佛门之水，孕涵彻悟之道，玄机禅理深化其中。

北京有“南城茶叶北城水”之说，因为会馆区、商业区均在南城，所以好茶叶也就聚于宣南地区。但南城地势低洼，水质实在不佳。北城地势较高，水质相对而言要比南城好些，特别是安定门外的上龙井、下龙井、满井均以水质甘清而誉满京华，故士大夫们品茶多从北城的名井取水。

雪水、雨水、露水沏茶也特别有韵味，但收集和保存均有一定的困难，非一般人士所能常年享用。况且雪水、雨水、露水也并非均是合格的饮用水，特别是露水之中含有各种不适合饮用的杂质和微生物。故用露水沏茶实为茶文化中的“败笔”。

雅器——哲理之所存

品茶四要素名茶、名水、雅器、清境之中，名茶、名水、清境均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难备，只有雅器最能显示茶人的文化素质以及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情趣。北京的士大夫阶层人士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均是茶人，茶人来自全国各地，也就把全国各地的茶文化带到了北京，茶具便于携带，又是茶人的心爱之物，所以茶文化中的雅器也就聚于京城。

陆羽在《茶经》之中精心设计了烹茶、品饮的 24 器即：风炉、宫、炭挝、火夹、鍤（釜）、交床、纸囊、碾、罗合、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铤、簋、熟盂、硫、釜、扎、涤方、渣方、中、具列、都篮。随着团茶的废弃，散茶的流行，泡茶法在内地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因此，陆羽的 24 器也就随之“过时了”，绝

大部分失去了使用价值。

清朝时期北京时尚对精美的茶具颇有讲究，但豪门俗贵和书门茶人对“风雅”是绝然不同的两种追求。俗贵们所追求的是金玉之气，色彩、造型方面均离不开“荣华富贵，福禄寿喜”。尽管瓷的质量很高，工艺很考究，可是仍是俗中又俗的俗物。更有甚者，在金玉其外的茶具内侧绘制“避火图（淫画）”，以六碗六式为下品，六碗十二式为中品，十二碗二十四式为上中品、二十四碗四十八式为上上品，实可谓有污茶的“灵韵”。

茶人对茶具的追求，是和茶的灵韵结合在一起的，茶具在色彩、造型方面均是古朴、典雅、大方，所以对充满金玉之气的“名瓷”并不感兴趣。而是偏爱于“紫砂”，紫砂茶具以宜兴最为有名，不夺香，不易味，不失色，注茶越宿，暑月不馊，实为品茗之雅器。

茶人们对茶具的追求还融入了对儒、释、道三家哲理的追求之中，因为社会留给茶人的自由天地太狭小了，想找一块暂时的沙漠绿洲也很难得。只好在把握于手的茶具之中追求理想的境界、人生的哲理、存在的价值、生活的情趣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儒家提倡中庸、尚礼和“天人合一”之道。茶人对盖碗茶也情有独钟。盖碗茶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有盖，故又称之为“三才碗”，三才者天、地、人也。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谓之“人”。儒家“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哲理融于一副小小茶具之中。道家崇尚自然，唯美情结在于返朴归真，“紫砂”质朴无华，典雅大方，充分地体现了道法自然的真谛。释家的禅宗主“顿悟”，紫砂“包袱壶”寄寓茶人清茗入口，立刻包容万物万机，悟含了天地宇宙。寄意深奥的茶具往往可集哲学思想、茶人精神、自然风情、造型艺术、书画神韵于一身，茶人以心灵的感受与纯真和茶具的清雅、简易、质朴、古拙相拥抱了，这种拥抱是况味了人生和世态之后

的接吻。

清境——返朴归真

提起酒来，人们立即会联想到“无酒不成宴席”，“灯红酒绿”，“行酒令之声通宵达旦”……甚至联想到“酒肉朋友”、“酒徒”、“酒鬼”、酒后无德，酒后闹事……，这不是在贬酒，也不是抑酒扬茶，而是说饮酒要有个尺度，只能恰到好处，否则难免有失大雅。正因如此，世人总好把酒和“热闹”联系在一起。“花间一壶酒，独饮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雅境确实不多。茶则不然，茶人一向主张茶境要清、静、净，也就是说要清新、安静、干净。清新就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安静就要远离世尘；干净就要自成一统，形成一个小天地。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选择茶境，于地而言，林间松下，溪畔岩旁、湖滨江浒、山巅谷底、洞侧泉旁、菊花丛中、幽篁深处……。于时而言，月白风清、林雪初霁、秋霜乍染、春朝花夕……。总之，秉天地之祥瑞，拥清茗之灵气，是茶人最理想的“茶境”。从历代茶人所绘的“品茶图”之类的佳作中，均可反映出投身大自然怀抱寻求解脱的追求。如元代茶人赵厚所绘的《陆羽品茶图》的画面上就是远山濛濛，近水悠悠，古木苍劲，茅屋轩敞的布局，给人以茫然大块、悠悠上苍，宇宙无垠的时间、空间感受。茶人置身于茅屋之下，小僮烹茶，此时此刻人与茶，人与大自然已融为一体，这是何等的解脱。文徵明、唐寅等明代的茶人画作，其特点也是都能契合自然，其画面大多显示了与大自然拥抱时的洒脱。或于林间清泉侧畔，鼓琴烹茶，泉水声、松涛声、水沸的韵响声与茶人的心声混然交织为一曲天籁；或于长享相聚，与友人品茗话别，古道西风，黄菊红叶望鸿雁南飞；或江畔品茗，“望大江东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回归大自然的茶境故然反映了追求解脱的心态，但也反映了茶人一种清静雅志的

处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清初文字狱肆虐，士大夫们立于朝不可能谏于朝。在万马齐喑的岁月里，只能躲入四合院的小天地里以求苟安，对外全封闭的四合院，对内却体现了一种“开放”的格局，这种对内的开放是相对于对外的封闭而言。茶人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寻求解脱，到躲入四合院内的茶寮之中寻求安谧，这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茶境”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行将走尽自己最后的路程时，尽管清王朝创造了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最后辉煌，但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茶人阶层的心胸却越来越压抑，道路也越来越狭窄，对未来也越来越迷惘。

四合院中茶寮大多建于幽僻之所，对于一般的茶人而言，三间书房往往是集书房、客厅、花厅、茶寮的功能为一区。由于茶人好在花间品茗，也反映了茶文化中回归自然的传统，斗室茶寮之中，所置的几盆花卉，甚能反映主人的情趣所钟和心中所求。

清人陆树声认为品茗之时独饮得神，二客为胜，三四为趣，五六曰泛，七八个人一起饮茶便有煞风景了。茶人的群体日趋狭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大夫群体日趋没落，茶文化的主流已由以茶雅志发展为以茶逸情，在“开言畏闻文字狱”的政治环境里，逸情最好的方式是“园居小寮禅栖其中”，躲进斗室之中与一盞芳茗“神交韵合”，于是在“顿悟”之中精神得以“解脱”，进入了“情逸意舒”的境界，顿悟之中的解脱，不同于“返朴归真”的追求，也不同于投身于大自然怀抱舒臆，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中的自欺。清、静、净的茶境离开了“清新”之后，“安静”、“干净”只能是主观上的感觉，因为京城士大夫们立身名利之场，求“静”只能是“闹市取静”，求“净”也只能是心中的“净土”。

二、北京茶文化的特征

(一)京师茶文化

北京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把全国各地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带到了北京。地方茶文化、民族茶文化的色彩、民族色彩很强，以不同途径进入北京的地方茶文化和民族茶文化使北京茶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故只能称其为京师茶文化。也就是说各地区、各民族的茶文化在北京地区争奇斗艳，各展风骚。具体说来宣南土乡的安徽、福建、浙江、江苏等省的会馆里，茶人、茶叶、茶具、茶境均显示了江南茶文化的风韵；内城众多的蒙古王公府第中，银器铮辉，奶茶飘香，饮茶之道仍保存着塞上草原的情调。但不论是“江南风韵”，还是“草原情调”都不可能是原封、原装的移植，因为在宣南的四合院中品茶，不可能同江南山庄中的茶室完全求同；内城的蒙古王公府第，也不是蓝天、白云之下，草原、大漠之上的毡包，故奶茶飘香也不可能伴随着孤烟、落日、长歌、牧火……，任何地方茶文化、民族茶文化进入北京之后均要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要京师化。所谓京师化就是在辐凑辐射的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北京茶文化。北京茶文化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大众化和社交化。所谓大众化就是北京各阶层的人士均有饮茶之好，不同阶层有不同的茶文化；所谓社交化就是北京各阶层的人士均把品茶、饮茶作为一种融入周边社会的方式。

（二）茉莉花茶甲天下

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而且特别钟爱“小叶双熏”。沏茶时讲究开水滚冲，以色浓味重为佳。所用茶具不避俾大，多用茶壶沏茶，沏成之后数人围壶执碗而饮。故有些南方茶人论及北京人饮茶之道时多有贬词，甚者认为北京人根本没有茶文化。理由是茶以“新”、“嫩”为佳，任何新嫩名茶如果经过了双重熏焙，茶的天地灵性神韵俱失，实难再称之为“茶”。茶经过开水滚冲之后，失色、失味，清淡、醇芬的芳茗成了一杯苦涩的“熟茶（茶叶被开水烫熟了）”，不但失去了“品”的风韵，而且饮起来也实难入口。茶具不避俾大，可谓有失饮茶之道的典雅，众多人据桌围饮，亦有失茶的精微神妙之道。持此论者或认为北京茶文化“不够档次”；或认为北京人根本没有茶文化。殊不知其所“贬”正是北京茶文化之所“成”。是北京茶文化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

江南茶人把江南茶文化移植到北京之初，无疑是南风、南韵。但北京的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同于江南。江南茶人大多是“隐士”，身居茶山，在茶园中依甘泉而筑茶寮，一杯清茗秉名山之灵气，聚千茶之新秀，假清泉之甘冽，可谓茶人置身于茶境。北京的“茶人”大多是朝士，列名庙堂之上，栖身四合院之中。明前（清明节前），雨前（谷雨节前）的新茶可想而知，茶山、茶园、茶寮之中执陆羽烹茶古器，在静、净、寂之中品味茶的清韵，追求茶的精神，更是昔日的过眼烟云。因为金榜题名之后，不但要“立”于朝，而且要“谏”于朝，时过境迁之后，士大夫们新的环境之中也形成了新的茶文化，也就是北京茶文化。

如果说北京茶文化是个大花坛，茉莉花茶和京味茶馆则是花坛中最有代表性的两朵奇葩。

茉莉花茶的加工过程要经过双煊双熏，十分彻底地脱了水，在封闭的容器中保存，不但不会发霉，而且还能保持茉莉花的浓厚醇香。茉莉花茶的加工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北京远离产茶地区，而北京人又有对茶的巨大需求所造成的茶叶运输和储存的困难。

高档茉莉花茶经过双煊双熏而成，不但脱水十分彻底，而且茶体收缩得也十分彻底，非用开水滚冲，其香、其色、其味难以充分显示出来。对茶略有爱好的北京人都知道沏“小叶双熏”用开水滚冲，沏绿茶则需把开水凉凉，否则会把绿茶沏“熟”了，只有苦涩之感，茶的清韵、芳醇、明淡……俱失。

北京地区的水质和茉莉花茶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金玉良缘。茉莉花茶的浓醇、醇厚、芳香经北京地区的开水冲泡后，可以说是色、香、味俱佳，使茶人茶兴顿生，沉浸于品茗的情韵之中。

京城茶人多是“朝士”，朝士和“隐士”比较起来确实是“公务繁忙”，每天要上衙门“点卯”，办理公干，不可能在茶室之中品“功夫茶”，一杯清茗喝上两个时辰。北京地区降雨量比较少，夏热冬燥，春秋好刮干旱的季风，饮食结构中又缺少水果、蔬菜，所以人们饮水量较大，一天之中总要痛饮几次才能保障身体不缺水。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不避俾大”的茶具可以说是客观需要，若再追求茶具的小巧，则使茶具的使用价值和观赏完全脱节。况且茶具“俾大”也未必就有失典雅，古朴、拙浑的造型往往更能显示出茶文化丰厚的积淀，更能给人以脱俗离世之感。

综上所述，北京茶文化是在荟萃各地区、各民族茶文化的京师茶文化的基础之上，在北京地区的具体环境下形成的。北京茶文化和南方茶文化之间的“差异”，正是北京茶文化能称其为茶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北京茶文化的特征。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北京的茶文化也就没有特征，也就没有北京茶文化了。在

北京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京城士大夫阶层起了主导的作用。因为京师茶文化的主体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大夫阶层，京师茶文化在北京安家落户成长为北京茶文化的过程，士大夫阶层也起了入乡随境的作用。使各地区、各民族的茶文化在北京地区融汇为一体，成为了独具特色的北京茶文化。

（三）四季茶序

北京的气候四季分明，但过渡期极短，所以人们“换季”的感觉十分明显。北京的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冬夏两季时间很长，春秋两季时间很短，春秋两季可以说是冬夏之间的一个暂短过渡。由于四季分明，而且过渡期极短，所以人们对换季往往有不适之感，需要进行“调节”。北京市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饮茶阶层，好用“茶”来调节换季时的不适应之感。

北京是名茶荟萃之地，北京人对不同的茶均有了解，从多年的饮茶经验之中得出绿茶“清火”，红茶“温中”，花茶“离绿红而得其中”。所以，北京许多人四季饮茶有序，冬季饮红茶、春季饮花茶、夏季饮绿茶、秋季饮花茶。北京人四季饮茶有序，在全国范围来讲是一种很特殊的现象，究其原因首先是北京人来自全国各地，把全国各地的饮茶习惯、风尚带到了北京，在“百花相竞”的情况之下，任何地区的茶实难独领风骚，只能占一席之地，具体到“茶序”上来说，也就是占一季之需。其次是北京地区汇集了全国的各类名茶，在任何一家大茶叶店中均可使茶人尽得所需。再其次是北京人中有钱、有闲之人的比例居全国之首位，故有可能对不同茶进行比较，按照四季分明的特点形成茶序，以调节骤然换季时的身体不适应之感。但从总体上来讲，北京人，特别是北京上层社会饮茶四季有序的习惯还是由于北京茶文化是在辐凑、辐射之中形成的，辐凑、辐射过程中形成的北京

茶文化反映到“茶人”身上时，就以四季饮茶有序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北京冬季漫长，各阶层的人均需在室内置取暖的火炉方能御寒，火炉宜于煮水烹茶，给茶人提供了方便。北京茶人在冬季虽然好喝红茶“暖肚”，但由于北京的气候冬季降雪量十分少，室内又置炉火，所以给人一种干燥之感，太燥了就要“上火”，因此不少北京茶人在冬季里好饮京西山茶。京西山茶名之为“茶”，实乃紫荆嫩芽。可用开水沏，更适宜置炉“熬”、“炖”，近炉“靠”，故冬季就炉品茶是北京茶人的传统。一些著述中认为中层以上人家不饮山茶，其实不然，中层以上之家的茶人不乏品山茶之士。因为造型古朴的砂包茶壶沏出（或熬、炖、靠出）的浓重醇厚山茶，初入口时有一种苦涩之感，但苦涩之后即使人产生生津、止渴的甜润与清韵，顿觉神爽心清。紫荆在植物学分类上不属茶科，但茶人视之为茶。从茶文化特别是北京茶文化的角度来讲，也就实应给京西山茶以一席之地。

北京夏季炎热漫长，城市热岛现象十分严重，囿于城区的人们实难寻一块避暑之地，所以入夏之后好饮“明前龙井”，“杭州贡菊”，以清热消暑。京西紫竹院，海淀六郎庄一带水塘中多种荷花，莲蕊、莲心有清心火之功效，茶人们在品饮绿茶时好以莲蕊、莲心同时沏入。于是茗醇、莲醇、茶韵、荷韵集于一盏之中。静静品饮，如入茶山浓荫清翠，似游莲湖倩盖玉立。茶山苦寂，莲湖不染。甘于苦寂之士当然不染世之污浊，不染世之污浊之士也只能沉浸在苦寂之中。以茶雅志，以茶养廉，以茶砺节的茶文化传统在一杯北京的夏日莲茶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士风、士尚、士节汇融在一杯茶人们夏日品味的莲茶之中。

北京的春季、秋季都很短促，春华易失，秋实难续。帝京之内似乎只有需要“清心”的酷夏和需要“暖腹”的严冬。春秋两季北京人好饮茉莉花茶，当茉莉花茶飘香时也就意味着北京的酷